

关于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论述选编 --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

一九八一年九月

说 明

为了适应中央党校高、中级干部轮训班和培训班党建教学的需要，我们编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各个班次学习时，可根据教学计划适当安排。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

一九八一年九月

目 录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节选）（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列 宁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节选）	（1）
列 宁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节选）	（28）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节选） （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斯大林	论列宁主义基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节选）（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斯大林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和德国共产党党员赫尔措格的谈话）（节选）	（55）
斯大林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节选）	（59）
毛泽东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60）
毛泽东	反对自由主义	（71）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节选）	（75）
毛泽东	《共产党人》发刊词（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毛泽东	改造我们的学习	（89）
毛泽东	整顿党的作风（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毛泽东	反对党八股.....	(97)
毛泽东	学习和时局（节选）.....	(113)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节选）（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毛泽东	关于健全党委制（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毛泽东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119)

列 宁

怎 么 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节选）

（1902年2月）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我们说，必须用七十年代的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那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的确，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但是，最近有人作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有把至今对这个问题的一切流行观点全部推翻之势。作出这个发现的是《工人事业》杂志，它在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进行论战的时候，不仅提出局部性的反驳，而且力图把“总的意见分歧”归结到更深的根源上去，即归结为“对自发因素和自觉的‘有计划’因素**相比**哪个意义大，有不同的估计”。《工人事业》杂志提出的指责是：“**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①。对此我们回答说：如果说同

① 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7页和第18页。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编者加的。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论战，只是促使《工人事业》杂志想到这个“总的意见分歧”，而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结果，那么单是这个结果也就使我们很满意了，因为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它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当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都非常清楚地点明了。

正因为如此，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普遍的关注，对这个问题应当十分详细地加以讨论。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九十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普遍**的。大约同一时期，在有名的1896年彼得堡工业战争^[2]之后，工人罢工也带有同样的普遍性。工人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什么“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在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甚至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与此同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九十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明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自觉性，因为工人已经不象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还不能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地抛弃奴隶般的顺从上司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九十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一定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

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就已经是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所有这些罢工本身都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同厂主的对抗已经激发起来，但是工人并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九十年代的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①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的完全固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① 工联主义决不象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排斥一切“政治”。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说明。

由此可见，当时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这里特别要指出那个常常被人忘记的（也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事实，就是这个时期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在**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而且在这方面他们充分注意到了当时还是抄本的小册子《论鼓动》^{〔3〕}中那些真正有益的指示）的同时，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作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一开始**就提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例如，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4〕}的那些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895年底就编好了定名为《工人事业报》的创刊号。但是这个准备好要付印的创刊号，在1895年12月8日夜里突然被宪兵从一个会员阿·亚·瓦涅也夫^①那里搜走了，于是第一次创办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纸的社论（也许过个三十年，会有一家象《俄国旧事》^{〔5〕}那样的杂志把它从警察署档案中找出来）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并且把争取政治自由作为首要任务。其次，有一篇《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②，是揭露警察摧残识字运动委员会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里省工人流血事件的通讯）。可见，九十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可以说是“初次的尝试”，并不是要办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要办一个想把罢工斗争

① 阿·亚·瓦涅也夫曾在拘留所被单独拘禁，因患肺病于1899年在西伯利亚东部去世。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证的情况公布出来，对于这些情况的确实性，我们可以担保，因为这些消息是从直接了解并最熟悉阿·亚·瓦涅也夫的情况的人们那里得来的。

② 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65—68页。——编者注

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凡是稍微知道一点运动实况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报纸一定能够既获得首都工人又获得革命知识分子的完全同情，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件事没有办成只是证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适应形势的迫切要求。《圣彼得堡工人小报》〔6〕也是如此；《工人报》以及1898年春季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发表的《宣言》〔7〕更是如此。当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把这种缺乏修养归罪于当时的活动家。但是，为了利用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吸取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因此极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在1895—1898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即“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策略①，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则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

① “《火星报》对九十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抱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细小的要求而斗争之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经济派在他们《给俄国各社会民主党人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12号）中这样说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有条件”的说法是同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不仅在九十年代末，即使在九十年代中期，除了为细小的要求而斗争之外，进行别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也是完全具备了的，当时只是领导者缺乏足够的修养。“经济派”不公开承认我们这些思想家、我们这些领导者缺乏修养的事实，却想把一切都归咎于“没有条件”，归咎于物质环境的影响，而物质环境决定着运动的道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试问，这不是屈从自发性是什么？这不是“思想家”酷爱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可是，当这种认识开始模糊的时候（这种认识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活动家中本来是很明确的），当有一部分人，甚至还有些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竟想把缺点推崇为美德，甚至想从**理论上**论证自己**对自发性的屈从和崇拜**时，这个小小的不幸可就成了真正的大不幸了，对于这个派别，用“经济主义”这一过于狭隘的概念来说明它的内容是很不确切的，现在该是做总结的时候了。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在讲到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在书刊上的种种表现之前，我们先要指出下面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这是我们从上面所说过的那些人那里知道的），根据这个事实多少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后来的两派之间的纠纷在彼得堡活动的同志们中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97年初，阿·亚·瓦涅也夫和他的几个同志，在流放之前，参加了一次非正式会议^[8]，到会的有“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的“老年派”会员和“青年派”会员。当时谈的主要是组织问题，特别是关于《工人储金会章程》问题，这个章程的定稿发表在《〈工作者〉小报》^[9]第九、十期合刊上（第46页）。在“老年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开玩笑地把他们叫作“十二月党人”^[10]）和一部分“青年派”（他们后来积极参加了《工人思想报》的工作）之间，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青年派”拥护的就是后来发表的那个章程的主要原则。“老年派”说，我们首先需要的决不是这个，而是加强“斗争协会”，使它成为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使各种工人储金会以及在青年学生中

进行宣传的那些小组等等都受它的领导。显然，争论的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意见分歧就是分道扬镳的开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极个别的和偶然的意见分歧。可是这个事实表明，即使在俄国，“经济主义”的产生和泛滥也并不是没有经过同“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的（现在的经济派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至于这个斗争多半没有留下“文件的”痕迹，**唯一**的原因是当时进行活动的各个小组的成员变动极其频繁，没有任何继承性，因此意见分歧也就没有用任何文件记载下来。

《工人思想报》的出现使经济主义暴露出来了，但这也不是一下子暴露的。必须具体地设想一下当时俄国许许多多小组的工作条件及其生命的短促（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具体地想象出这种情况），才能懂得新派别在各个城市里成败的偶然因素是很多的，才能懂得为什么这个“新”派别的拥护者也好，反对者也好，都长时间不能断定，并且简直是根本无法断定这究竟真是一种特殊的派别呢，或者只是个别人缺乏修养的表现。比如《工人思想报》头几号的胶印版，甚至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不知道，而我们现在所以能够引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的社论，只是因为弗·伊一申的文章（《〈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7页及以下各页）中转引了这篇社论，而弗·伊一申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来热心地 狂热地 夸奖这个同上面我们所说的各种报纸以及准备出版的报纸大不相同的新报纸。^①而这篇社论却是值得谈一谈的，因为它把《工人思想报》和整个经济主义的**全部精神**都极其明显地

^① 这里顺便提一下：弗·伊一申夸奖《工人思想报》是在1898年11月，当时经济主义，特别是在国外，已经完全形成了，就是这位弗·伊一申，很快就成了《工人事业》杂志的一个编辑。而《工人事业》杂志当时却否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派的事实，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否认这个事实！

表现出来了。

社论指出穿蓝色袖口衣服的人^①阻止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接着写道：“……工人运动如此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并且把这个基本论点进一步作了详细的发挥。其实，领导者（即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可以说是被警察从工人手中夺去的^②，但事情却被说成是工人同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人们不去号召前进，号召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而去号召**后退**，号召专作工联主义的斗争。说什么“由于力求时刻牢记政治理想而对运动的经济基础模糊了”，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工人为工人”。说什么罢工储金会“对于运动比上百个其他的组织更有价值”（请把1897年10月说的这段话和1897年初“十二月党人”同青年派的争论比较一下吧），如此等等。所谓我们应当着重注意的不是工人中间的“精华”，而是“中等的”即普通的工人，以及所谓“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③等等之类的话，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论调，并

① 指沙皇警察。当时沙皇警察穿蓝色袖口的制服。——编者注

② 从下面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比拟是恰当的。这个事实就是：在“十二月党人”遭到逮捕之后，什吕谢尔堡大街的工人中间流传着一个消息，说这次遭到破坏是由一个同“十二月党人”的某个外围团体有密切联系的奸细尼·尼·米哈伊洛夫（牙科医生）促成的，于是这些工人非常愤慨，决定要杀死米哈伊洛夫。

③ 这也是从《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那篇社论中摘录下来的。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11〕的理论修养究竟怎样。当马克思主义者正在书刊上同这位早已因这样理解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而得到了“反动勾当的能手”这个雅号的真正的瓦·沃·先生作战的时候，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却在重复这种把“经济唯物主义”粗暴地庸俗化的论调！

且对许多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这些青年往往只是从合法书刊上的论述中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断而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

这表明，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而这种自发性出自那些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出自一部分工人，这些工人听信以下的说法：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这类词句是西欧资产者向来爱用的武器，他们因仇视社会主义而亲自动手（如德国的“社会政治家”希尔施）把英国的工联主义移植到本国土地上来，向工人说，纯粹工会的斗争^①就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和什么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现在也来重复这些资产阶级的词句了。这里必须指出三种情况，这些情况对往下分析**当前的**意见分歧^②是很有用处的。

第一，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也是**自发地**发生的。这好象是在玩弄辞藻，但可惜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越来越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

① 德国人甚至有“Nur.Gewerkschaftler”这样一个专门名词，意思是：主张纯粹工会斗争的人。

② 我们强调**当前的**，是要请这样一些人注意，这些人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说：现在斥责《工人思想报》是很容易的，不过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我们回答当前这些伪君子说：这里暗指的就是你。关于这些伪君子完全被《工人思想报》的思想所征服的事实，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证明。

沃。”“青年派”越来越多地登上舞台。姑且不谈亲身参加过当前俄国运动的人，就是任何闻到过运动气味的人也十分清楚，事实正是这样。然而，我们特别坚持要读者彻底弄清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为了明确起见而引用有关第一次创办的《工人事业报》以及1897年初“老年派”同“青年派”争论的材料，是因为有些标榜自己有“民主作风”的人，总是利用广大公众（或者很年轻的青年们）不知道这个事实来投机取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而还要讲到。

第二，根据经济主义最初在书刊上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种极其独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当前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这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杂志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个事实向我们表明：《工人思想报》一开始就已经着手（不自觉地）实现《信条》这一纲领。这个事实表明（这是《工人事业》杂志始终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①，什么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②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为了补充我们以上所

① 《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经济派”的来信。

② 《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

说的话，我们还要引用卡·考茨基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下面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①。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批评派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着重号是卡·考茨基加的）。于是这些批评派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可以想见：被人用上述方式驳倒的这一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越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越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根源在于现代经济关系，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其实，现代的经济科学，也象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尽管无产阶级怀有极其强烈的愿望，它却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着重号是卡·考茨基加的），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

① 《新时代》〔12〕第20年卷（1901—1902）第1分卷第3期第79页。卡·考茨基谈到的纲领起草委员会的草案，由维也纳代表大会（去年年底）稍加修改后通过〔13〕。

外面灌输 (von Außen Hineingetragen) 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 (ur - sich) 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新草案接受了旧纲领中的这个原理,而把它勉强附加到上面所引的那个原理上去。但是这样一来,道理就讲不通了……”

既然谈不到有独立的、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思想体系^①,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

①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全体工人的觉悟水平,就必须使他们不要自己局限于阅读被人为地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而要越来越多地学习领会一般读物。更正确些说,不是“自己局限于”,而是被局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在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读物,而只有某些(坏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制度的情形,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

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说什么无论最热情的思想家怎样努力，终究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条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这种说法**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如果这些作者能够把自己所说的话大胆而透彻地通盘思考一番，正如每个从事著作和社会活动的人都应当这样来仔细思考自己的见解一样，那他们就只好“把一双没用的手交叉在空虚的胸前”，而……而把阵地让给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或是把阵地让给祖巴托夫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神父加宪兵的“思想体系”的路线上去。

请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走上（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盛情参与下）的那条进步党^[14]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所需要的不是谈论什么轻视自发因素，什么过程策略，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而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做法。为此需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也正是由于许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比如说，柏林的工人才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这种斗争直到现在也远远没有结束（也许那些根据普罗柯波维奇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历史，根据司徒卢威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哲学的人，会认为斗争已经结束了^[15]）。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是分属于几种思想体系：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